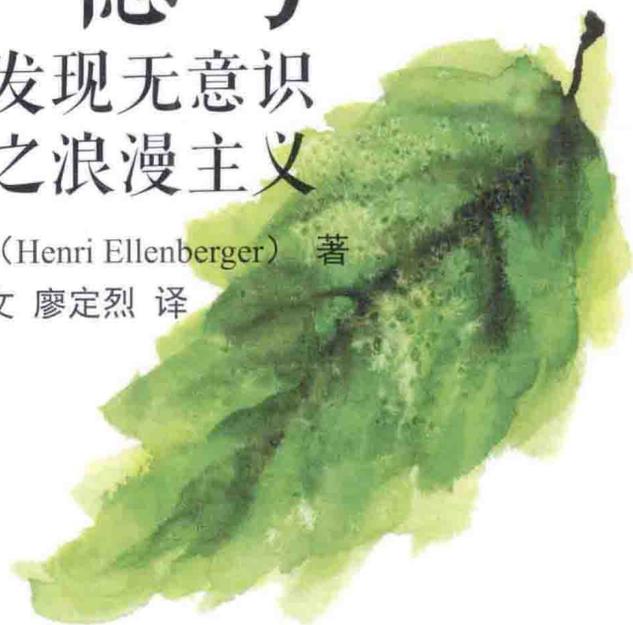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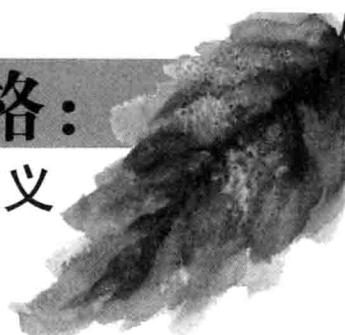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与 荣格：发现无意识 之浪漫主义

[美]亨利·艾伦伯格 (Henri Ellenberger) 著
刘絮恺 吴佳璇 邓惠文 廖定烈 译



解读神化般的人物
诠释精神动力学的演进
探索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密码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弗洛伊德与荣格： 发现无意识之浪漫主义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美]亨利·艾伦伯格 (Henri Ellenberger) 著
刘絮恺 吴佳璇 邓惠文 廖定烈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与荣格：发现无意识之浪漫主义 / [美]亨利·艾伦伯格 著；刘絮恺 吴佳璇 邓惠文 廖定烈 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1

书名原文：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ISBN 978-7-5100-8928-2

I. ①弗… II. ①艾… ②刘… III. ①心理学—社科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9537号

By Henri F Ellenberger

Copyright © 1970 by Henri F. Ellenber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说明：本套书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引进出版，此书为第一册。



弗洛伊德与荣格：发现无意识之浪漫主义

著 者：[美]亨利·艾伦伯格 (Henri Ellenberger)

译 者：刘絮恺 吴佳璇 邓惠文 廖定烈

责任编辑：曹 文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张跃明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64077922)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3

字 数：293千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图字01-2013-8368

ISBN 978-7-5100-8928-2

定价：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Sigmund Freud and Psychoanalysis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 第一章 弗洛伊德的生平 / 003
- 第二章 弗洛伊德的家庭背景 / 006
- 第三章 弗洛伊德生涯中的重要事件 / 019
- 第四章 弗洛伊德的人格 / 073
- 第五章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人物 / 092
- 第六章 弗洛伊德的学术成就 / 101
- 第七章 弗洛伊德的思想源流 / 202
- 第八章 弗洛伊德的影响 / 222

Carl Gustav Jung and Analytical Psychology**第二部分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 第一章 荣格的生平概略 /231
- 第二章 荣格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240
- 第三章 荣格的人格 /265
- 第四章 与荣格同时代的人物 /271
- 第五章 荣格的学术成就 /279
- 第六章 荣格的思想源流 /342
- 第七章 荣格的影响 /351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出现，使得动力精神医学史有了新的气象。当其他同时代的学者，如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等人，仍旧留在传统的科学组织、大学、历史悠久的学术社群中，仍在接纳各式各样观点的医学与心理学期刊上发表著作，而从未企图建立一个学派时，弗洛伊德则公开与官方医学决裂。弗洛伊德的出现，开启了动力精神医学各种学派林立的新时代。他们有自己的正式教条、紧密的组织、专属的期刊、密切的同志关系，要被他们所接纳，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训练期。这样，新形态动力精神医学的建立，就和某种巨大的文化革命密切相关，后者之规模可与达尔文所引发的变革规模堪比拟。

第一章 弗洛伊德的生平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56年出生在摩拉维亚（Moravia）地方的弗莱堡（Freiburg），1939年卒于伦敦。除了他生命中的最初四年和最后一年，他的一生全在维也纳度过。

1856年，奥地利帝国仍然持续地受到1848年革命的震撼，这次革命后来以军队镇压收场。26岁的弗朗西斯·约瑟夫一世（Emperor Francis-Joseph I）正尝试着要削减军队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个人权力。^①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使奥地利成了中欧的强权。1857年，这位年轻的皇帝决定把维也纳建设成这个庞大帝国的现代化首都。他拆除了旧的城墙，空出空间来修建“环城大街”（Ring），再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在其两侧盖起了壮丽的宫殿和建筑。在大兴土木的这些年中，虽然帝国享有了空前的工业与经济上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却多次遭逢挫败。1859年，奥地利被皮埃德蒙（Piedmontese）和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击败，而失去了伦巴底（Lombardy）；1866年，奥地利与普鲁士交战，旋即在萨多瓦（Sadowa）被迅速击溃，导致威尼斯（Venetia）失守。因而奥地利帝国必须放弃对德国和意大利的野心，把眼光望向巴尔干半岛，寻求政治与经济上的扩张，

^① 在这里，我们的依据是 Alfred Kasamas, *Österreichische Chronik* (Vienna: Hollinak, 1948)。

并在此遇上了逐渐壮大的俄罗斯。1867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奥匈帝国。1875年，邻近的波斯尼亚（Bosnia）与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叛变，反抗土耳其统治，引发了俄土战争（1877—1878）。这一冲突后来在柏林会议中得到解决，将此二省置于奥匈帝国的保护之下。1890年，维也纳的郊区并入首都，居民突破一百万，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都市之一。

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er of Serbia）与皇后于1903年被刺，这使得塞尔维亚进入与奥匈帝国公开敌对的状态。1908年土耳其发生“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s）革命，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并吞。帝国境内的种族冲突及官方语言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舆论关注的焦点，则是在1912至1913年发生的巴尔干战争。

1914年6月，奥地利王储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和夫人于萨拉热窝（Sarajevo）被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奥匈帝国战败，于1918年11月瓦解。由帝国残骸中诞生的小国奥地利共和国备受社会与经济波动的影响，动荡不安。1926年，奥地利的经济与政治情势有了短暂的改善，但随之出现了1927年社会主义者暴动、多尔福斯首相（Chancellor Dollfuss）被刺事件，最终则是纳粹于1938年2月间占领维也纳。弗洛伊德通过有影响力的朋友帮忙得以获救，他前往英国，于1939年9月23日卒于伦敦，享年83岁，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三周。

弗洛伊德的一生是从中产阶级底层爬升到高层布尔乔亚的范例。在经过多年的不支薪大学讲师的困苦生涯之后，他成了维也纳最出名的医师之一，又有令人称羡的非常任（兼任）教授^②的头衔。他所做的神经学研究，

② 相对于常任教授（Ordinary Professor）。——译注

研究对象大部分来自下层阶级，但那些他借以形成精神分析理论根基的患者，却主要来自上层的社交圈。在50岁出头的年纪，他已是一个运动的首脑，而此运动的影响逐渐扩及整个文明世界的文化生活，因而到他近60岁的时候，已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当他在伦敦流亡期间去世时，则被视为抵抗法西斯镇压、争取自由的象征。

第二章

弗洛伊德的家庭背景

关于弗洛伊德的家庭背景，我们仍然知之甚少，而所知的这部分则必须参照19世纪奥匈地区犹太人的处境才得以了解。在解放^①以前，奥匈地区的犹太人仍是各自成群，其政治、经济、社会处境迥异。^②

在维也纳有所谓的被当局容忍的家族。^③虽然犹太人在1421年和1670年两度被逐，然而在19世纪后半叶又出现了以几个既富裕又有影响力的家族为基础而重建起的“第三社群”（third community）。在三月革命前的时期（Vormarz, 1790—1848），他们的人口数目明显增加，而且即使有法律条文的限制，他们在经济生活上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纺织和谷物的贸易方面。

另一个在维也纳的犹太社群是所谓的“土耳其—以色列”（Turkish-Israelite）社群，成员是来自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与撒洛尼卡（Salonika）的西班牙系（Sephardic）犹太人，他们长期受到苏丹的保护，^④

① 指1852年开始，对犹太人所采取的较宽容的政策，此点下文还会提到。——译注

② Gerson Wolf, *Die Juden*, in *Die Völker Oesterreich-Ungarns. Ethnographische und culturhistorische Schilderung* (Vienna u. Teschen: Karl Prochaska, 1883), Vol. VII.

③ Hans Tietze, *Die Juden Wiens. Geschichte-Wirtschaft-Kultur* (Leipzig and Vienna: E. P. Tal, 1933).

④ Adolf Zemlinsky, *Geschichte der Türkisch-Israelitischen Gemeinde zu Wien* (Vienna: M. Papo, 1888).

说的是西班牙—犹太的混合语言，而且其希伯来文的腔调与那些说德语的犹太人不同。据说他们是其他犹太人艳羡的对象，其他的犹太族群曾试着要加入他们，却被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在某些城镇也有所谓的犹太街（ghetto）犹太人。有个在普列斯堡（Pressburg）出生和念书的犹太富商西格蒙德·梅尔（Sigmund Mayer）曾经详细描述过在那儿的犹太人生活。^⑤普列斯堡在当时有四万名居民，其中犹太人约为五千名，他们全集中住在一条很长很窄的街道上，两头有门，每天晚上警察都会把门锁上。街道两头之中有一头属于本镇，另外一头则是一位匈牙利大亨帕菲伯爵（Count Palffy）的产业，住这一头的居民，受到的暴虐限制比较少，但是不管是住在哪一头，都没有权利购屋或置产。街道两面都是商店和住宅，而且居住环境很拥挤。有些居民是工匠，但大部分都是开店的商人。有些人生意做得很大，特别是纺织业。因为犹太人是镇上唯一的商人群体，这些街道自然整日挤满了上门的顾客。

而由于竞争的缘故，犹太人的生活压力很大，他们都工作得很狂热，每天从大清早工作到夜晚，每周工作六天，其余时间则完全奉献给了宗教活动。他们每天要到犹太教堂（Synagogue）祈祷两次，而且以最正统的方式庆祝安息日（Sabbath）以及犹太节日。孩子们在犹太教堂上学，在那里主要读的是希伯来文的圣书，但对其内容几乎是浑然不解。对大多数人而言，这都只能说是个痛苦的经验。

他们的家庭生活非常家长制，男人是家里无可置疑的权威。诚然家庭里的纪律十分严格，但父母总是尽力帮孩子打算未来。在这限制重重

⑤ Sigmund Mayer, *Ein Jischer Kaufmann, 1831 bis 1911. Lebenserinnerungen von Sigmund Mayer*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11).

的处境下，每个人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因而他们发展出一种特别的心灵状态，一种严苛而出自本能的潜抑、无可遁逃的诚实和骨子里带着的讽刺的机智 [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路德维格·伯尔纳（Ludwig Borne）等作家身上可以见到，他们都是在犹太街长大的]。他们主要的特征就是害怕：怕父母、怕老师、怕丈夫、怕拉比（rabbis，犹太祭司）、怕神，而最怕的就是异教徒（Gentiles）。西格蒙德·梅尔这样写道：“在普列斯堡，若有基督教的小孩打我们，是没有人敢还手的。”最终，犹太街里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其中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有贫穷的和富有的，还有一些豪富家庭的贵族阶级。有名的诸如冈珀兹家族（Gomperz）、托迪斯科家族（Todesco）、乌尔曼家族（Ulmann）、帕彭海姆家族（Pappenheim），这些家族彼此联结，组成了广大的商业与社会的网络。

其他犹太族群则散居各处，处境彼此迥异。在凯洁（Kittsee）这个位居维也纳及普列斯堡之间，属巴塔尼（Batthyaniy）伯爵所有的城堡脚下的小镇里，有一个活跃而繁荣的犹太社群，他们的职业是谷物交易商，仓库与住家都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享有相对的自由，而且在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之间有很活跃的贸易活动。

很多奥地利犹太人住在加里西亚地方的小镇和村庄里，他们与波兰农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其熟稔的程度，从他们彼此甚至以熟人之间才用的“你”（Du）来称呼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这群犹太人的心智特点与犹太街的犹太人颇不相同，他们多是行走各地的小贩，比较穷的把行当背在背上步行于各地，家境好些的才有自己的马车。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生意人、工匠、客栈老板或小农。

那些18世纪末在加里西亚生活的犹太社群，在《波尔乔的贝尔回忆录》（1732—1805）里有生动的描绘。^⑥贝尔是个犹太商人，致力于自己社群的文化生活，他描述了他们的贸易、交易规则、商业往来、货币、信用与价格，也描述了某些成员与国外商业中心的密切关系、马背上的远征、对语言的知识以及与基督徒间的友好关系。贝尔还描述了这些犹太社群在“卡哈尔”（Kahal）管理之下的自治。所谓“卡哈尔”，其功能涵盖了法律问题、经济活动、慈善机构，同时也负责收税，“卡哈尔”有自己的管理方式，而且有自己的警力。除了“卡哈尔”之外，还有宗教上的领袖“拉比”，以及“达扬”（Dayan，法官）。在贝尔的描述里，一个令人惊讶的特征是其文化生活的活跃性。除了对学问的尊敬以及对有智能的拉比的崇敬以外，在正统犹太人与哈西迪主义者（Hassidism）以及哈斯卡拉（Haskalah）的追随者之间，持续存在明显的争执。贝尔讽刺地提到了他所受的塔木德经（Talmudic）教育以及教义问答（pilpul）。后者指的是学者之间热忱地争辩塔木德经中一些隐微之处，其彼此之争往往琐碎到不可再细的程度，而且总是各依己意，撷取经书片段，断章取义地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论点。18世纪的前半叶，在这些加里西亚的犹太人之间，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学复苏了起来，因此，出身提斯米尼卡（Tysmienica）的雅各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父）会写流利的希伯来文，并不令人意外。

在摩拉维亚，犹太人是被禁止永久居留的。那里的犹太人大部分是从加里西亚来的移民，其居留证期限为六个月，过了此期限就要再申请

^⑥ M. Vishnitzer, trans. and ed., *The Memoirs of Ber of Bolechow (1723—180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延长。而且他们只能在特定的旅店停留，即所谓“镇立旅馆”（städtische Bestandhäser），所有权属于镇，而租赁给旅店主人。要在私人的处所居留，则要付出额外的税捐。这些严苛的处境并没有阻止摩拉维亚的犹太人进行商业活动，而事实上当局也鼓励这些活动，因为对地方有利。

这就是在解放之前的犹太人的处境。1848年那次不成功的革命引起了一阵短暂但严苛的反弹，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犹太人，但1852年开始了开放政策的时期。1867年犹太人被正式赋予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事实上这些权利他们早在十年前就已享有。大量的犹太人从帝国四处涌入维也纳，临近的俄罗斯居民也大量迁入奥匈帝国。

* * *

解放以及犹太街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只是从乡村迁移到都市，从各省迁移到维也纳，其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部分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企图通过认同周围的风俗、仪态、服装及生活方式，来寻求“同化”。而说着依地语（Yiddish；14世纪夹杂了希伯来语的德国方言）的犹太人，改用了标准的现代德语。这些“同化”的犹太人，以所谓的开化犹太教的方式，保留了自己的宗教；其他犹太人虽然宗教感淡薄，但在传统上仍依附于他们的小区。有些犹太人则更进一步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宗教，这个宗教对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由于当时强制每个人都必须有宗教信仰，因此当他们的要登记自己的宗教时，就填上天主教或基督新教。某些正统犹太人的社群，仍然努力保持他们的信仰、仪式和风俗。当我们在读到诸如西格蒙德·梅尔^⑦或斯

^⑦ Sigmund Mayer, *Ein Jüischer Kaufmann, 1831 bis 1911. Lebenserinnerungen von Sigmund Mayer*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11).

汤达尔（H. Steinthal）^⑧的作品里对犹太街生活的描述时，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好奇的乡愁，缅怀过去宗教生活与道德纪律还很严格的那个时代。

显然，像如此广泛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变革，给相关的家庭或个人带来了很多问题。这种情况类似欧洲移民初到美国时，从一个文化转变到另一个文化的情形。对很多年轻人而言，解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验，开启了从未设想过的可能性。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曾经如此谈过他的父亲利奥波德·布洛伊尔（Leopold Breuer）：

他那一代的犹太人，首度从精神上的犹太街步入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实在难以轻忽他们那一代人展现出的精神活力。从佶屈聱牙的方言转为正确的德文；从犹太街的狭隘转为更有教养的西方生活，进一步接触德国的文学、诗歌和哲学……^⑨

另一方面，在正统的犹太家长与离经叛道的孩子们之间，也出现了很多冲突，孩子们无法了解父母们所熬过来的生活。弗洛伊德提到当他10岁或12岁的时候，父亲对他提到年轻时发生的事，有一次走在街上，一个异教徒从身旁经过，把他（雅各布）的帽子丢到街上，然后说：“犹太人，滚出人行道！”弗洛伊德当时问他父亲那时怎么做，雅各布回答：“我走到路上把帽子捡起来。”^⑩小弗洛伊德当时把父亲的行为看成是懦弱的表现而觉得愤慨。这种小故事阐明了上下两代之间的鸿沟，或许也可以说明

⑧ Heymann Steinthal, *Ueber Juden und Judentum.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G. Karpeles, ed. (Berlin: M. Poppelauer, 1906).

⑨ Joseph Breuer, *Curriculum Vitae in Hans Meyer, Dr. Joseph Breuer, 1842-1925, Nachruf*, 23. Juni 1925 (n.d.), pp.9-24.

⑩ Sigmund Freud, *Traumdeutung* (Leipzig and Vienna: Deuticke, 1900), p.135.

“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概念的产生。

解放的进一步结果，就是犹太人必须像其他公民一样办理登记。很多人用了新的名字、姓氏与捏造的出生日期；他们在犹太社群里用一个名字登记，在犹太社群外用另一个名字，所以他们有双重身份。在奥地利，公民登记通常并不严谨，公民登记员通常依照人们口述的出生日期来记载结婚或死亡证明；在官方文件上，出生地可能也会和以前的居住地混淆。因为这样的理由，史学家想引用当时的奥地利官方文献，尤其是有关犹太人的资料时，需持谨慎的态度。

在奥地利，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未曾出现反犹太风潮（anti-Semitism），此事实也促进了同化的趋势。在维也纳，犹太人的人口稳定地增加，19世纪初是几百人，在1880年有七万两千人，1890年有十一万八千人，1900年达到十四万七千人。^①其中，有很多律师、医师和科学家。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群中，格伦瓦德（Max Grünwald）所提到的有眼科医师茅特纳（Mauthner）、生理学家弗莱雪·冯·马克索（Fleischl von Maxow）、解剖学家祖克坎（Zuckermandl）、皮肤科专家卡波西（Kaposi）及蔡索（Zeissl）、喉科专家史托克（Stoerk）与施尼茨勒、温特尼茨（Winternitz）、小儿科专家卡索维茨（Max Kasso-witz）、耳科专家波立采（Politzer）、实验病理学家所罗门·史垂克（Salomon Stricker）及神经科专家莫里茨·班奈迪特（Moritz Benedikt）。^②另外，还有约瑟夫·布洛伊尔以及弗立德（Fried）与巴拉尼（Barany）两位诺贝尔

① Hans Tietze, *Die Juden Wiens. Geschichte-Wirtschaft-Kultur* (Leipzig and Vienna: E. P. Tal, 1933), p.231.

② Max Gruenwald, *Vienn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36), pp.518-523.